

性情与担当

——
茅盾的矛盾人生

钟桂松
著



性情与担当

——茅盾的矛盾人生

钟桂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情与担当:茅盾的矛盾人生/钟桂松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309-08577-8

I. 性… II. 钟… III. 茅盾(1896~1982)-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2384 号

性情与担当:茅盾的矛盾人生

钟桂松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42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77-8/K · 360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我心中的茅盾

十九世纪末茅盾诞生在江浙交界的一个水乡古镇——乌镇。二十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时，其父母给予了他良好的启蒙教育，一进入小学茅盾就显露出他的早慧和天才。从他文采飞扬、思想深刻的作文中，少年茅盾展示出他的勤奋和天才，“小子可造，勉成大器”，分析世事“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等非同凡响的评语，也展示了老师的伯乐眼光。老师的殷殷之语激励着这个水乡文弱少年，他在心中耸起一个“成一家”的高远目标。然而，湖州的碎语，嘉兴的除名，环境和时代的动荡，使他在中学时代有些手忙脚乱。母亲的坚定和远见，一句“只要年份上不吃亏”，暖了三春，等到茅盾中学毕业，她又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含泪拉扯大的儿子送到北京。一九一六年，茅盾夯实了中国文学修养的基础，离开北京大学，走进东方大都市的商务印书馆。

机缘，对一个人的成才至关重要。当初若没有人推荐茅盾进商务印书馆，而他只在乌镇这个小镇上教书，那么，茅盾晚年至多只能是一个县政协委员。反之，机缘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因为并不是所有进商务印书馆的人都能成大器。

从月薪二十四元的阅卷员开始做起，茅盾并不厌倦这些琐碎机械的工作，而是善于利用商务这块知识宝地，不断地进出涵芬楼这个编译所图书馆，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充实。又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他给开明而德高望重的经理张元济写了一封关于《辞源》的信，其中既有赞扬又有批评。这一封信，改变了青年茅盾的境遇。这时，那些天天在

一起的同事、上司才发现身边还有一个叫“沈德鸿”的青年才俊。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一干就是十年。其间，他当过下手，协助人家编杂志，又主持过中国第一个新文学杂志：《小说月报》，风光遍及中国。同时，因为他的风光、锐气和才华深为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所赏识，陈从北京到上海，召见密谈的人之中就有茅盾。茅盾成为中共党员之后，不遗余力地为党的成长努力工作。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成了二十年代青年茅盾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鼓舞着青年茅盾为之奋斗。五卅运动、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无论在广州，还是在武汉，都可以看到在运动中奔波的年青茅盾的身影。那时，他认识了后来成为汉奸的汪精卫，也认识了后来成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沈雁冰从武汉撤退到九江，奉命去南昌参加军事行动，即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但从武汉撤退下来的热血青年如潮，九江上岸，负责接头的董必武就对刚上岸的沈雁冰说，去南昌的路已经不通，你回上海吧。说完董必武就消失在人海里。在同伴的怂恿下，沈雁冰和宋云彬等人带着一股惆怅的情绪上了庐山，本来想翻庐山走小路去南昌，不料，上山后才发现那条小路也已断绝。曾是汉口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对中国革命感到茫然和困惑，在庐山的清凉世界里依然无法挥去刚刚发生在武汉热烈惨痛的一幕，焦虑和困惑让他病倒在庐山旅店，整天躺着，脑海里回放着刚刚过去的惨烈伟大的一幕！

为躲蒋介石的通缉令，沈雁冰又从庐山下来潜回上海，守在夫人的病榻边，足不出户，以汹涌奔腾的笔势，记录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一幕，并定题为《幻灭》。五十年后，同时代人又想起当年中共组织曾对茅盾回上海有过“隐于笔耕”的嘱咐，而茅盾在回忆录里却只字不提。这是后话。当他在白色恐怖下用“矛盾”作笔名，将书稿送给《小说月报》青年编辑叶圣陶时，叶圣陶琢磨着，“矛盾”作笔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不如加个草字头，改作“茅盾”。隐居在景云里的沈雁冰也同意了。小说发表后引起轰动，沈雁冰继续写他

的小说,《幻灭》、《动摇》、《追求》陆续出版,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茅盾”!

一颗新星熠熠生辉,然而“茅盾”是谁?却引起世人的议论和猜测,当时,海宁徐志摩向苏州叶圣陶探询,叶圣陶没有告诉他。后来徐志摩碰到宋云彬,说:“‘茅盾’不是雁冰,是谁?”说毕,两人都笑了起来。海外学者夏志清教授则说:茅盾因《蚀》一炮而红。这话虽有政治偏见,但也道出了茅盾写小说一炮成功的事实。《子夜》的诞生,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奠定了茅盾在现代文坛的地位。之后的《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构成了茅盾史诗性的系列小说,尤其是二十世纪前四五十年,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风云、人情冷暖及炎凉世态都可以在其小说中见到。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茅盾有三个亲人献身革命:胞弟、女儿、女婿。茅盾作为新生的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则为了理想和事业殚思竭虑,恪尽职守地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他写出一篇篇饱蘸深情的评论,扶持甚至挽救青年作家,成为新中国青年作家的一代良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拒绝写文章批判已经倒地的朋友,也拒绝给别有用心者的外调者出证明。光明磊落,堪为益友。所以,丁玲平反回京,首先想到去看望沈老师——茅盾。其情其景,可歌可感。五十年代初对电影《腐蚀》的禁映,茅盾既无一句题外话,也无一句题内话。六十年代初那场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风雨里,作为原作者的茅盾,却冷眼向洋,不置一词。这种少有的忍耐和大度,让后生晚辈顿生敬仰之情!七十年代中期,茅盾敏锐地预感到,中国又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清明时期,他悄悄地回忆自己的一生,并整理成文,七十年代后期,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开写新文学回忆录之先河。

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成为沈雁冰一生言行的写照。临终前的两个遗嘱,至情至诚,感人肺腑,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崇高的敬礼！

茅 盾

余生也晚，与茅盾既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其文其德，其精神其风范，足可成师表，也可为民族楷模，道德文章，足以让国人高山仰止。一千四百多万字的精神财富，不仅奉献给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贡献给了二十一世纪，甚至更久以后。

茅盾是人不是神，他的早慧，他的天赋，他的刻苦，他的伟大，足以让人仰视；但他同时也呼吸空气，食人间烟火，也有病痛，也知饥冷。对茅盾个人生活的感情波折，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津津乐道。大惊小怪有神化的嫌疑；津津乐道则有窥人隐私、嗜痂的嫌疑。总之，许多事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对伟大人物要心存宽容，对历史的描述，对茅盾的描述，也理应如此。

功过是非，向来在人心。至今，无论是茅盾故里，还是在祖国的心脏北京，每年都有人在纪念他，怀念他。他，一个从乌镇走来，走向世界，走进人民心里的茅盾，他的道德文章、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里，激励我们奔向未来。

目 录

自序:我心中的茅盾	1
一九二七:有关茅盾的另一说	1
“大连会议”引发的历史往事	11
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始末	59
一九四九年:茅盾与张元济的一段新缘	85
茅盾和表弟陈瑜清	97
茅盾曾劝阻姚雪垠上书毛主席	101
茅盾与商务印书馆	109
茅盾与杭州	113
“文革”中茅盾在香港出过书吗?	127
茅盾“懦弱”吗?	131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143
“强求一致,反伤团结”——从茅盾的三封信说起	151
《腐蚀》:从小说到电影	157
茅盾小说中江浙方言俗语的运用	167
茅盾谈出版的一篇佚文	173
从倡导“为人生文学”到史诗手笔	181
茅盾的当代意义	185
茅盾作品欣赏札记六题	189
舐犊情深:茅盾和他的女儿沈霞	205
沈霞日记:一个理想追求者的内心独白	247
后记	255

一九二七：有关茅盾的另一说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常为人们所说及的年份。

这一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杀戮中共后借助一些政治势力上台，开始统治中国达二十二年之久；这一年，中共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这一年，人民领袖毛泽东发动名垂千秋的秋收起义，国人也常常由此记住一九二七年这个年份。

这一年，文化史上也有许多值得叙说的往事。首先是鲁迅在厦门教书并不如意，决意以写作为生，于这一年十月定居上海，很快这面左翼旗帜在黄浦江边飘扬直至一九三六年巨星殒落；这一年，沈雁冰化名茅盾从政治战场上下来，写出《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一时洛阳纸贵，不经意间成为一个新文学的作家，并一发而不可收，由此成为著作等身的文坛巨匠！所以，一九二七年真是一个风雨彩虹齐呈现的年代。

稍微读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茅盾一九二七年以前的经历，茅盾一八九六年出生在浙江乌镇，姓沈名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一九二七年写作《幻灭》时始用的笔名。他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一九二六年开始，茅盾以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活跃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活跃在大革命中心的茅盾突然回到上海，隐居在家里发愤写作，写出了轰动中国文坛的小说《动摇》。但是茅盾为什么从政治漩涡中抽身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在学术研究界似乎已成定论。学术界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茅盾思想上充满矛盾、苦闷以及没有党组织指示的孤寂，于是茅盾开始写作。已故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叶子铭先生在其专著《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八月版）中说：“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他们封闭工农组织，屠杀共

产党和革命者，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受失败。汪精卫集团叛变后，茅盾就离开了汉口，先到牯岭住了一段时期。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大批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使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时期。当时，茅盾也受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一九二七年八月底他回到上海，陷入精神上极端苦闷的时期。就在这充满矛盾、充满愤懑、充满苦闷的情况下，他回忆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茅盾研究专家邵伯周先生在《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版）中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茅盾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由于‘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所以思想情绪一度陷于悲观失望的境地。就在这种情况下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和《创造》等几篇短篇小说。”茅盾研究专家庄钟庆先生在专著《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版）中也说：“那时，茅盾由于同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思想情绪非常矛盾和苦闷。然而，他并不绝望，他拿起文艺创作这一武器，开始了新的战斗。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出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同样，庄钟庆先生从茅盾自述里看到了一九二七年茅盾“非常矛盾和苦闷”的思想，而此时的思想与“同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有关。

而新世纪的一些茅盾研究专著里，也给予基本相同的结论，只不过遣词造句更具有当下色彩。如有的论者说：“一九二七年，茅盾脱离了从产生之日起就被视为非法和造反者的政党，但仍然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压制，因而成为政治上双重的边缘人和流亡者，并以这样的身份和处境在都市里以写作为业。”（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和上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三月版）；另一部专著也说茅盾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目击了国共决裂，“于是离开去南昌，因途中遭阻塞，去了牯岭，突然生病，到八月中旬从牯岭回上海，从此便成为职业小说家”。（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月版）

七八十年来,学术界通行的茅盾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而对形势产生困惑从而用创作来抒发自己的思想的这种定论显然已成为一种主潮,都认为一九二七年茅盾离开党组织又遭蒋介石的通缉之后,思想上一片迷茫,被逼无奈才去从事小说创作的,而茅盾本人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

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十一号甲)的三楼上,足不出户,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止的病榻旁(德止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出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所以,一九二七年的沈雁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茅盾”的。换言之,沈雁冰回到上海后即怀着迷茫的心态和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甘愿隐居家中足不出户去从事创作的。学界研究结论与作者自述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假如我们回放当时的历史场景,回到历史现场,也许还有

许多问题要追问：当时沈雁冰年纪虽不大，但也已是三十岁的人了，而且经历了中共创建，经历了五卅运动，经历了广州事件，也刚从政治中心武汉回来，政治活动能力及政治经验相当丰富的沈雁冰何以能耐得住这种蛰居生活？难道当时的中共组织真的离他这么远吗？让这位一直在从事地下斗争的青年革命家如此束手无策？当初大革命失败后有许多同志潜回上海，是否也一样找不到组织？沈雁冰去找他们了吗？而这一些本该进一步寻觅的话题，几十年来学术界似乎都忽略不计了，似乎沈雁冰带着悲观和迷茫潜回上海后，隐居在小楼上写小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与茅盾同时代的黄慕兰女士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七月版），对一九二七年的茅盾由政治转向文学的人生转折却有另一说。

黄慕兰，又名黄定慧。一九〇七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六年秋始，历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中共中央暨南方局、北方局秘书兼机要交通员。三十年代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五十年代因错案受审查，一九八〇年平反。

对黄慕兰女士，稍知茅盾经历的人都不陌生，茅盾与黄慕兰很熟，回忆武汉那段经历时，还专门谈到黄慕兰。茅盾在创作中谈到一位地下党工作者坐黄包车丢失机密文件，此人就是黄慕兰。抗战时黄慕兰还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帮过大忙，茅盾在回忆录中对此也有记载：“这时，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十分活跃的黄慕兰已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上海《每日译报》的发行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为了全集的出版，还来过香港，和我见过面、叙过旧。”黄慕兰晚年为平反一事，与茅盾有多次交往，茅盾也为这位昔日战友奔走呼吁，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茅盾全集·书信集》里还收录了茅盾晚年与黄慕兰交往的四封书信。因此，黄慕兰对一九二七年茅盾的情况应该是知情者之一。

黄慕兰在“自传”中讲述一九二七年从武汉撤退的情形时写道：“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六月中旬，我和希俨就在武汉报纸上登了启

事，辞去本兼各项职务。希俨早已把《民国日报》的工作移交给了沈雁冰(茅盾)同志，这时又辞去了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委工作。我把妇女部的工作交给了刘清扬同志，并辞去了其他各项兼职。行前我和希俨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将三千元的支票交给茅盾同志，并传达董老指示，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蔡叔厚)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蔡叔厚即第三国际驻中国的联络员。”

这里，黄慕兰的回忆提供了一九二七年关于茅盾的一个新的说法，即当年茅盾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写作，是遵循了中共党组织的指令。换言之，是党组织让茅盾回上海“隐于笔耕”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九二七年茅盾从政治转向文学是有所根本的，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党组织，对中国革命前途迷茫，充满矛盾和悲观失望而闭门著书的。

据黄慕兰回忆，一九二七年党组织对沈雁冰的吩咐和嘱托，她是亲历者，记得很清楚，所以在一九八〇年，黄慕兰与茅盾两位老友京城相聚谈到党龄时，黄慕兰还提醒茅盾：“你的党籍党龄问题，可以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当年遵董老所嘱，奉命隐于笔耕。数十年来，从未失去无产阶级立场，请求中央给你作一个全面的鉴定。你也不需再提什么重新入党问题，我估计中央一定会全部追认你的党龄党籍的！”对此，据黄慕兰回忆，当时茅盾听后说过“你完全正确”的话。

那么，茅盾在回忆录中对一九二七年离开武汉时的情景又是怎样回忆的呢？

我在栈房里隐蔽了半年月，大约在七月二十三日，我接到党的命令，要我去九江找某个人，并交给我一张二千元的抬头支票(所谓抬头支票，即支票上有收款人姓名或别号，收款人得此支票，仍须经过商店保证或他本人有钱存别家银行，即可由此银行转账。抬头支票是保证万一支票遗失，拾得者不能取钱。)要我带去交给党组织。那时船票极难买，费了大劲，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号”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和另一个姓宋的，不过他们不是有任务去九江，而是搭船先到九江，

再换船回上海。我上船一看，乘客一半是面熟的，很多是共产党员。我们住的是统舱，三个人只有两个铺位，由于天热、拥挤，统舱像个蒸笼，我一夜汗流浹背，未能入睡；幸而傍晚船开，第二天清早就到了九江。我们上了岸，找了个客栈住下，我就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我走进屋里，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谭平山。董老看见是我，就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我把二千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他，他说，你带到目的地去。我不敢多耽，转身出来就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不卖票，说是马回岭一带通不过，只有军车能通过。我只好走出车站，无意中碰到许多同船来的熟人，都是要去南昌的。他们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这样就把马回岭那一段路越过去了。他们还说昨天恽代英从牯岭翻山过去了，郭沫若也上了牯岭，要去南昌。于是我决定上庐山。宋云彬他们听说我要去庐山，定要跟着去游玩，我也不便说明，只好同意。

后来因形势的发展和身体原因，茅盾在庐山养病半个多月后只好秘密回上海，不料，回上海途中，所携带的支票出了意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想不到镇江码头上有军警搜查旅客，搜查我的那个兵发现我带的那张二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我无行李，就怀疑起来。我急中生智，低声对他说，这东西我不要了，我送给你罢。那个兵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我走了。”

可见茅盾当时的记忆与黄慕兰的记忆大致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支票的数字上有些不同。茅盾在回忆录里还写道：“至于我失掉的抬头支票，当时报告党组织，据说他们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由蔡绍敦（也是党员，后改名蔡叔厚）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这二千元。”

如果一回上海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那么“支票”遗失怎么向党组织汇报？这个回忆也说明，茅盾回到上海后，与党组织并没有失

去联系。茅盾在回忆录中还说过：“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说明在去日本之前，茅盾与中共组织是有联系的。武汉那一段经历，对黄慕兰来说是记忆犹新的。况且对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来说，特殊工作要求养成强记的习惯，所以“自传”中许多往事给人历历在目的感觉。因此，黄慕兰自传中有关一九二七年茅盾的说法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而她的说法又与七八十年代茅盾研究界的结论不甚相同。茅盾是在离开了共产党组织后一片迷茫苦闷之中去从事创作？还是奉中共组织之命“隐于笔耕”？茅盾从政治转到文坛的往事值得研究。